

选择

张荣臣 / 著



中国共产党执政论

XUAN ZE ZHONG GUO GONG CHAN DANG ZHI ZHENG LUN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论

张荣臣 /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张克敏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马 晶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选择——中国共产党执政论/张荣臣著. —北京: 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035-4194-0

I. 选… II. 张… III. 中国共产党-执政-研究 IV. 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9538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印装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4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7.00 元

前言

中国共产党建立有 88 年，执政也有 60 年了。回首过去，中国共产党走过了艰难曲折但却依然辉煌的道路。展望未来，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探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掌好权，《选择——中国共产党执政论》一书就是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和探讨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时期共产党执政理论的。

1949 年 3 月 25 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移驻北平。路上，毛泽东异常兴奋，形象地把今后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宏伟事业比作“进京赶考”。怎样考出好成绩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京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

实际上，早在执政前，毛泽东就思考过共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史封建王朝先兴后衰的周期率问题。1945 年 7 月 1 日，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飞赴延安访问。7 月 4 日，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到他家里作客。他们谈了一个下午。最后，毛泽东诚恳地问黄老：您来延安考察了几天，都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浥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①

黄炎培的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中国历史上长的王朝几百年，短的也就几年，几个月，几天。自秦王朝到清共 60 多个正式的王朝，平均统

^①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8 页。

治时间 60 多年，就是跳不出先兴后衰的周期率。从表面看，是政治争斗，也就是皇族集团中的成员争夺帝位，外侵，天灾，民变，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具体就体现为封建专制统治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压抑。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历史悠久，自秦始皇奠定了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大一统局面后，历代相沿。各个朝代都实行封建王朝的皇权至上。这种集权制度，皇权就是一切，皇帝一个人独断专行。这种封建专制造成天下只是一家人甚至是一个人的天下。人民群众的对立，最后都没有摆脱历史的周期率。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是非常熟悉的。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这是毛泽东在革命即将取得成功后所考虑的。他在回答周期率问题时坚定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以此为目标，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了不懈的努力。

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①党执政后面临的革命任务更艰巨、更复杂；某些党员干部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下思想作风可能发生变化，“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②因此，要把党的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有必要继续保持和发扬我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所强调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③。为防止党内对个人的歌功颂德，中央专门做出 6 条规定：不给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8—1439 页。

建国之初，为了打击资产阶级对干部腐蚀、拉拢的猖狂进攻，使党的优良作风得到继续发扬，党中央开展了“三反”、“新三反”运动。1952年夏，“三反”运动胜利结束。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基本上解决了从中央到省、市、专区和各级机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贪污和浪费问题。但由于“三反”运动仅仅解决了机关中领导者与被领导的机关工作人员相脱离的官僚主义现象，因此，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官僚主义现象，有的问题十分严重。这败坏了党的作风，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必须下决心解决。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充分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迅速开展“新三反”斗争。“新三反”斗争是“三反”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它进一步解决了“三反”运动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三反”运动在一个短时期内，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采取急风暴雨的方式进行，而“新三反”斗争则是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与当时的主要工作结合起来进行，从而更深入地使领导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保持了良好的工作作风。“三反”、“新三反”运动是我党执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这场运动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发扬无产阶级政党优良的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毛泽东领导下，“三反”运动取得伟大的胜利，这对于整肃党纪，保持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腐败分子，党和毛泽东采取从严治政的方针，无论涉及到谁，绝不姑息迁就，而是严惩不贷。据统计，在“三反”斗争中被开除党籍者有23.8万余人，被劝告退党者达10万人。在处置一批腐败分子中，不但于1952年2月1日对北京中央公安部行政处长宋德贵处以极刑，还毫不留情地打掉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两只“大老虎”。处决刘、张二人，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对于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实践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也率先垂范，廉洁自律，以实际行动倡导执政党党风建设和新中国的清廉政风。1950年5月，沈阳市政府要在该地为毛泽东铸铜像，毛泽东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后来，沈阳各界人民又要求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在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示：“这是可以的”；在“铸铜像”

旁批示：“只有讽刺意义”。当年9月20日，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等人：“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在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刻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0月27日，他又否决了为其在天安门建铜像的意见，批示“不要这样做”。1954年，他专门写信给湘潭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要求基层组织对自己的亲属放手管理。信中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对自己的子女，毛泽东更是严格要求，并将爱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

今天重新思考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感到毛泽东当年的思考是十分有预见性的。一方面，我们要把毛泽东当年设想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路继承下去，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发展和创新。这是因为同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相比，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不过160多年，中国共产党也不过建党88年，如何创新一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人民民主新路，共产党人任重道远。十分明显的是，在毛泽东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中，党的作风建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虽然看到了执政党和领导革命的党的不同，但如何解决执政党存在的问题，他强调的是通过整风的形式，通过整风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早在1953年，他在党内首先提出设一线二线的主张，希望让年轻一些的领导人担任更重要的工作，随后又提议不再兼任更重要的工作，不当国家主席，1958年的八届六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并传达到了全国。毛泽东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使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但毛泽东接班人问题还是没解决好，究其原因，就是毛泽东太相信个人的魄力，他始终没有从党的领导体制和党的自身建设上实现执政党建设的战略转变，没有建立起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党的领导制度，没有找到执政后党的自身发展的正确的推动力。

二

20世纪后期，短短几年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些执政的共产党纷纷退出执政舞台。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事件的发生？“合力论”是一个说法，认为是多种因素在起作用。恩格斯也提

出，任何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都不是单一的原因，而是“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结果。但即便是在合力中，也有主次和深层表层之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有关因素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任意夸大或缩小某种因素的作用。从根本上说，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危机是一种政治危机，归根结底导源于长期形成的僵化的党和国家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共终于不得不面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机制的危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苏联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是“某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所以使党的领导削弱了，人民参与国家失误的权力被剥夺了，官僚主义和官僚阶层形成了。因此，要对社会的这种机制进行根本的变革，对于党来说，就是要对党的一切进行革新，清除那些同官僚主义相联系的东西。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的努力方向是对的，但这种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一是苏联党和国家的体制是长期形成的，不能指望一下子解决；二是这些改革措施已超出了苏联党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一个长期僵化的社会中，一旦起动某些重大的措施，特别是涉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的控制，这些措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失控的导火索，后来的发展果然如此；三是改革的太晚了，一个好的体制应该是处在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到问题一大堆再谈改革，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总之，体制的因素决定了苏联党的建设的失败和苏联的最终解体。

二十大以后，苏共表面上还保留有一个大党的地位，但这只是外表了。它放弃了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也就意味着它是苏联社会中一个普通的政治组织；它强调尊重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也就使党放弃了集中统一的体制，成了各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一个形式上的外壳，削弱了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它强调党内干部和党员可以成立横向联系的组织，也就意味着党内派别存在的合法化，这就造成了党内巨大的离心力。由于这些因素，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苏共日益暴露出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丧失。这时的苏联经济大幅度滑坡，商品奇缺，人民生活水平恶化。苏共先是以不干涉经济为由，没有提出任何改革经济的措施，后又起草了几个脱离实际的改革纲领，因而导致了人们对苏共的极大不信任。1991年8月，苏共被停止活动。

作为有着长期历史传统的苏共未能在改革中奋起，反而在改革的冲击下瓦解了，这使人们不能不深深地思索。苏共的瓦解，当然不能归咎

于改革本身，改革是苏共必走的一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在探讨苏共瓦解的原因中，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僵化的体制，这种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但对于探讨社会历史发展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体制，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个非常完善的体制，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政治组织也好，都是在既有的体制下发挥作用的。而且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历史上是起过作用的。那么为什么苏共会在改革中瓦解呢？邓小平曾经对我们党的政治体制有过分析，早在1979年7月，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谈话中说：“政治路线确定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①在苏联也是这样，在改革过程中执行什么样的路线，直接决定改革的成败。戈尔巴乔夫等人，不相信共产主义，不相信社会主义，由此失去了为之奋斗的精神动力。在改革中表现为机会主义，没有原则，左右摇摆。非但没有实现党的领导体制的转型，而是削弱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了共产党的性质，放任和鼓励反共势力的发展，结果便导致苏共丧失政权。在苏共的演变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已经存在的合理性和潜力的东西已经被挖掘尽。

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表现在：一是在指导思想上鼓吹“多元化”，否定马列主义指导作用，进而否定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二是在奋斗目标上推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放弃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三是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党内由思想混乱发展到组织分裂，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四是实行多党制，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进而实行总统制，使总统个人取代苏共中央，剥夺共产党的领导权。上述几个方面完全改变了苏联共产党的性质，使苏共向社会民主党转变。戈尔巴乔夫不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只提“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苏共不再是政治体制的核心和社会的领导力量，而变成其他政党、社会团体的平等伙伴。苏共不再是战斗先锋队，而只是起议会作用的党。苏共是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党有根本区别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重新转向社会民主主义，实际是对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否定，也是对苏共自身的否定。这样做，也就否定了苏共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三

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整整60年的探索充满着艰辛，在人们议论“中国模式”成功的背后，更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探索是没有休止符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既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提出了许多崭新课题。

一是由领导革命的党转向执政党，不仅意味着党的地位的转变，还要求党的理念和活动方式要跟着转变。作为领导革命的党，其理念和活动方式就是革命，并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这一革命。当然，革命和阶级斗争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主观发动的东西，而是中国社会客观现实的要求。但在长期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思维方式活动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过去的痕迹，同当前执政党建设的要求很不适应。执政党理念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发展稳定。执政党也不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实现这一点，而是要和谐社会。在社会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和人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完成这一转变，对于全党和广大党的领导干部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二是由领导计划经济转向领导市场经济，不仅是领导的经济模式的转型，还要求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在过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领导阶级斗争的党。从执政以后，开始把经济建设看作是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经过党和人民的不懈努力，我们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胜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不仅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开始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移。这也是对我们党的挑战，即要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同市场经济多元化要求的关系。党既要具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又要具备协调利益、整合社会，进而巩固群众基础的本领。这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任务和历史性的课题。

三是一个正在领导市场经济的执政党必须解决权力腐败的大问题。

早在1956年，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指出了执政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考验，“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①为什么得出这个判断，因为执政就是掌握权力，执政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标志，也使我们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表现为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用手中的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时如何防止权力对党的侵蚀。

上述三大挑战和新的历史条件要求我们从时代要求出发，思考共产党如何执政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执政党，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更广泛的代表性，是它执政的前提，这也决定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型的党，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那一套进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又是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的功能上和一般的执政党没有什么不同，这就要考虑如何借鉴其他执政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进行党的建设。执政党如何使自己的决策和运行机制适应执政的特点，如何按照执政的要求建立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恰恰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一个科技日益发达，信息爆炸的社会里，在一个民主、自由、平等成为人们共识的社会里，要使党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群众奋斗，实现执政党的作用，在内部机制上，政党就要用比以往更宽容、更开放的姿态吸引支持者。要以更民主、更平等的机制使它的成员更关注党的命运。必须有更灵活、更广泛的上下沟通渠道和信息反馈机制来收集信息和处理具体问题，这样更有利于政党实现自己的目标。

一是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如何在执政过程中，构筑一个共产党自身特点的党政关系是共产党执政后一个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列宁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初期，是希望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政权，让全体人民都参加国家管理，后来列宁感觉由于俄国文化和教育落后，不可能立刻使劳动人民实现对国家政权的管理，因此，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既然是由党代表人民实行国家管理，就产生了党政关系问题。执政党要决定大政方针，这无疑是对的，但哪些是党的职能，哪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些是国家机关的职能，应有基本和明确的划分，而不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苏共党政不分的体制影响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体制的选择，几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一种固定不变的体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的执政能力的高低，关键取决于两点：一是各级领导干部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二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这些变化还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一步展开。要做好各项工作，把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就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而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二是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党群关系问题。党群关系也即先锋队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宣布自己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政党。问题在于，在执政后通过什么形式和手段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如何密切党群关系，这是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执政以后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极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被人民抛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群关系这个本来是共产党最不应该出现问题的关系，在党执政后却成为我们的最大危险，这确实要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理应成为我们党执政要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从本质上讲，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身没有自己的利益。但是，执政的党，是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执政就意味着掌握权力，不承认这一客观现实，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能有效地解决现实中由权力因素所带来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如何对执政党权力的范围进行界定，并监督制约这一权力的运作。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代表着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甚至走向失败和垮台。共产党必须做到清正廉洁，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要做到这点，就要立足于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进一步完善党的权力运行机制。

三是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党内关系问题。执政条件下处

理党内关系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而核心是党内民主。这样一种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按照列宁的说法，党是根据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内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来处理。必须让全体党员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问题能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概括地说，党内民主就是全体党员依照党章共同行使党内权力。党内民主是党的肌体和运行机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执政条件下的党内民主更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人民民主的发展。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把民主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一个为着消灭一切不平等，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政党，没有理由在自己的活动中排斥民主原则。更重要的是，共产党是广大党员按照自愿原则结合起来的、为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奋斗的组织，在它的各成员之间也必然是平等的。所以，党内民主是共产党的本质属性，是决定共产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重要因素，在党的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发挥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团结统一也是党的生命。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强调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明确要求“全党同志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统一整体。每个党员都是为着实现党的政治纲领和理想，自觉自愿地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党的这种共同的思想信仰、理想和统一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是使党内团结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牢固基础，是共产党人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既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又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没有党内民主，党的生命就会窒息；没有集中统一，党就会失去战斗力。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是民主集中制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一条重要的党内纪律。

四

共产党建党 88 年、执政 60 年了，今天总结转型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和执政理论，是有许多参照物的。一是我们党的执政历史，中国

共产党的执政历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二是国外一些大党老党的执政历史，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就必然垮台。”^①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我们的远大目标相比，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②“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奋勇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③

第一，坚定地举起改革的大旗。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只有对共产主义的科学的论证，没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模式，也没有关于执政党如何执政的经验。列宁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特别是关于党领导苏维埃建设的理论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探索。我们不能把当时的苏联社会，看作社会主义的当然模式，特别是不能把苏联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为特征的高度集权的体制看做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的领导体制。所以说，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改革就始终是一种常态。没有改革便没有出路。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没有改革，党和人民都无法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的认识是正确的。他看到了过去沿袭下来的、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那套社会主义的模式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已经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所以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但这时苏联的社会政治发展体制已经病入膏肓，无论戈尔巴乔夫采取什么改革措施都不能挽救苏联的命运了。可以说，

^①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②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③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不是改革葬送了苏联党和国家，而是没有早早地改革，没有走在时间的前面。没有在这些问题上不足以毁灭整个苏维埃国家时进行改革，等到这一体制已无法克服其矛盾时再着手，已经太晚了。

中国共产党要坚定地举起改革的旗帜。作为一个代表工人阶级执政的先进性政党，没有理由不举起改革的旗帜。更进一步地，我们不仅要举起改革的旗帜，还要走在改革的前面，不能让改革推着我们走，而要领着改革走，这才是领导党的责任。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群众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如果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脱离时代，因循守旧，便会被时代所抛弃，被人民群众所抛弃。工人阶级政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这一性质不是自封的，需要在实践中作出回答。政党是阶级的代表，如果党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是代表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人民群众只能作出其他的选择。党的先进性，意味着党要有社会发展的战略眼光，开拓进取，能够率领人民群众走向现代化。

当然，改革也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动力。但创新又不是否定历史，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而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根据新的实践不断探索。同时还要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从目前来看，很难承受社会动荡造成的损失。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几百年所走的路，社会主义用几十年、甚至几年走完。作为领导改革的共产党必须走在改革的前面，否则会被改革所吞没。领导改革，建立一个社会发展稳定有序的环境，这是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在这样的形势面前，采取回避的态度，将成为历史和社会的罪人。

第二，执政是一门科学。

执政是一门科学，这是我们总结国外执政党和我们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坚持科学执政，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执政，把执政建立在更加自觉运用规律的基础上。从大的方面说，这个规律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具体说，我们应当深入调查研究，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和经济规律，

驾驭市场经济，发展自己；研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推动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文化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研究以人为本的社会运行规律，构建一个各方面群体和阶层和谐相处的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多样化发展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运行规律，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进步。对规律的研究与把握，能使我们的思路和行动更符合客观实际，更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意愿。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政党是否真正成熟，能否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执政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水平与把握程度。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党所处的地位、所担负的角色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究竟应该确立什么样的执政理念，不仅是党所必然面临和必须解决的“怎样执政”、“如何执政”的根本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党执政的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显而易见，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执政理念，党就无法完成执政的使命，更谈不上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

“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贯穿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的就是这条主线。我们党成立88年、执政60年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的根本依据，始终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建党88年、执政60年，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不断实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

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奋斗的最高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自它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确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党的全部政策和实践活动都必须以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第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是一句空话。

纵观古今各国各类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执政经验可以发现，所有执政者要巩固其执政地位，都要争取社会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不能否认，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党的执政地位是以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为前提的。列宁强调党的领导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如果党自身不能从体制上保证这个党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没有别的私利，那么，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一句空话。

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宣布自己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政党。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执政，都不是为了一党一派的私利，而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问题在于，在执政后通过什么形式和手段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如何密切党群关系，这是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执政党的客观情况，又决定了同群众关系的复杂化。执政之前，尽管党面临的环境十分复杂，担负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但由党夺取政权的任务所决定，各方面利益关系比较简单，政治分野比较清晰，党群关系也相对容易处理。人民群众把自身利益实现的预期大都放在党夺取政权以后。因此，一旦执政，党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也变成这个问题。但是执政后党面临的形势纷繁复杂、问题千头万绪、矛盾层出不穷，人民群众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党要巩固执政地位，搞好社会整合，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而苏共的失误也表现在这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